

论道

# 全面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 张道根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世界经济关系结构处在前所未有之大调整大重组中,我国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增长转型、结构转变、动能转换的新阶段,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必须全面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 深刻认识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紧迫性重要性

产业链体系完善健全、安全可靠,产业链的能级、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体现国家发展整体水平。尤其对大国特别是人口占世界近1/5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提升自身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链体系不断完善,产业链能级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我国产业链基本特征有三。

一是产业链体系最为齐全。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大的大国,一、二、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关联度大而复杂,从农业、采掘业到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再到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产业链很长,成为全球产业链体系最为齐全的国家之一。产业链体系不断扩张、产业链条持续加长、产业链专业化分工深入拓展,驱动长时间大规模投资,吸引源源不断的要素投入,带来1979—2018年我国经济年均近两位数高速增长。

二是制造业产业链规模最大。目前,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四分之一,制造业占GDP比重高于任何大型经济体。2007年我国制造业占GDP比重33%,达到峰值。世界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占GDP比重一般为22%。我国地域空间大,经济腹地广,制造业产业链完整,相关产业配套服务能力强,产业链竞争力较强。制造业产业链在规模扩张基础上不断优化升级,持续改善我国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我国实体经济的生产率,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不断提升了人均收入水平,带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整体较快提高。

三是产业链尤其是制造业产业链全球产业链网络联系紧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主要靠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出口拉动,国外需求、国际资本、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是我国制造业发展和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力量。我国进出口总额与GDP比重从1978年9.7%,到2006年上升至峰值64.2%,去年已降至33%;我国是世界第一、第二、第三大贸易国,也是全球最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2016年直接投资流出量首次超过流入量;世界最为繁忙的十大港口有6个在中国,以上海为最。联合国根据航空线路、运输能力和运量,计算出运输网络指数,2015年我国为167,排名第二,仅次于新加坡117,美国、英国、荷兰则在95—98之间。融入世界

经济,参与国际产业链体系,解决了长期困扰发展中大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不足、技术不足、企业家不足等问题,发挥了劳动力极其丰富、资源要素和环境成本相对低的比较优势,抓住了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后发赶超。

科学把握我国产业链发展水平,要深刻看到问题。一是我国产业链结构体系总体偏重。由于我国国情环境不同于美国等大国,人口规模总量巨大,可耕地、森林、矿产和水资源等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环境问题严峻并具有长期性。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体系扩展长时间依赖大规模投资驱动,过多依靠重工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支撑,结构明显偏重,不可持续,难以以为继。我国在2011年后劳动力总量增长由升转降,劳动力数量和规模优势日趋减少。农村人口跨省向城市迁移数量增长明显放缓,从2005—2010年每年1100万降到2010—2015年不足500万。结构快速变化和经济增长快速显著放缓,处理债务积累、压缩过剩产能,推动企业去杠杆等问题更为复杂,必须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环保、集约、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二是我国产业链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我国产业链体系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制造业分解重组与区域重组过程形成的,依赖“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带动增长,更多是引进、承接、拿来和模仿,缺乏底层技术支撑和关键核心技术引领。许多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工具和软件受制于人,发达国家控制着从芯片到新材料、生物医药、高效发动机及控制操作软件等核心和关键技术。同一般国家包括某些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规模和水准不高。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链价值偏低。没有强大的科技基础和技术能力支撑,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关键产业链可控度低,超大型经济体要开发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并摆脱贫困的技能,还是可以的,但要找到通往高收入国家的道路,恐怕非常难。

三是我国产业链体系在发挥中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极大改

变了我国产业链演进发展机制,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政府“看得见的手”调节干预依然过强。尽管在下游行业和外贸行业市场竞争力比较充分,但在某些重要工业和制造业领域包括金融等在内的服务业中,对外资、民资等行政限制和市场壁垒仍然较多,庞大的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增强,政府行政力量、行政手段仍然过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规模宏大的全面深化改革规划,关键和重要领域市场化改革创新突破有些仍然很难落到实处。尽管党中央国务院从上到下加强了体制内各种检查督察,但体制内的行政问责和行政整改依然缺少实质性制度变革。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和产业链提升,从根本上要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否则没有出路。

### 加快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主要举措

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立足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目标方向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链体系、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水平。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发挥大国经济超大规模市场需求的巨大优势,拉动产业链体系优化。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已迈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的发展阶段已过,传统重工业产能过剩,可廉价复制的创新存量少了,找到更好的生产性投资项目更不容易,还要防止虚拟经济加速膨胀驱动国民经济虚高度化。必须把促进和扩大居民消费放在优先位置,推动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依托最终需求扩大来拉动产业链体系优化。消费需求是最稳定的永恒的,把14亿中国人民生活搞好了是最大的事。随着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渐趋放缓,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的潜力将得到更大发挥,更强劲、可持续、多样化的消费需

求,将拉动产业结构、供给结构重组、转型、升级,推动新技术应用,带动产业链新一轮优化升级。我国居民消费占比远低于人均GDP相近的国家,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提高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比例,更加注重分配公平,防止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稳步提高消费占GDP的份额,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让更多人过上更健康、更多样、更好的生活。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是人口大国最大优势,十几亿人民消费需求升级,是拉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引擎。

二是要进一步做专、做深、做细国内产业链,发挥我国产业体系齐全的优势,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要看到,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经济结构多层次性、区域发展不平衡,在相当长时期仍将存在。这既揭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能级层次不够高的客观原因,也预示着我国产业链深化拓展有着很大空间。高科技产业自主创新很重要,塑造引领未来经济,为其他产业提供通用技术。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长期繁荣发展,主要由量大面广占国民经济比重份额最大的中低技术部门决定,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我国中小企业占比96%以上,中低端产业覆盖面和附加值比重超过了70%—80%的国民经济增长,也是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支撑。“十四五”期间以至更长时期,更加注重推动量大面广的产业和企业技术进步和应用,更加注重着力提高普通劳动者知识技能,大力运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拓展和提升产业链体系水平和能级,是中国未来持续发展升级的最大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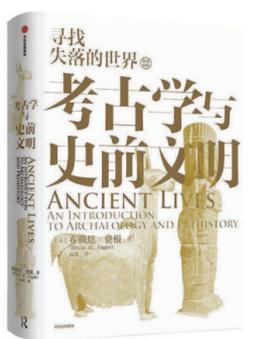
三是要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补齐关键产业链的技术短板,提升产业链体系的能级和价值链层级。要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咬住“卡脖子”关键技术,举全国之力,用国际化市场化办法,创新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实现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防止各级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太长,防止科技创新“大跃进”,防止盲目攀比大规模科技国际竞赛,防止钱都变成纸而纸再也不能变成钱。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要只争朝夕、奋力攻坚,也要突出重点、扎实推进、久久为功,不能一哄而上,不能一味烧钱,不能任意吹大高科技泡沫。注重抓人才培养、人力资本投资和全体劳动者知识、技能和素质提高,把更多的钱投在全体国民的创造力、创新能力、技能素质和科学知识提升上。中国最多的是人口,中国最要解决的是人的生产生活,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链提升,只能走符合现代化发展规律、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与知识密集型发展道路。我们的国情、发展环境、发展条件等不同于美国,学不了美国那种大规模资本、资源投入支撑科技密集型经济发展的模式。弄不好可能陷入举国科技竞赛的陷阱,拖累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四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扩大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基础性制度创新,明确界定和保护各类产权,依法保障外资、国资、民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公平竞争、一视同仁,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市场化国际化自由流动。健全法治体系,改进完善司法体制,充分尊重和严格保护企业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破除城乡分割二元经济结构,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体系。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坚定不移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挥上海自贸区新片区、海南自贸港等最高水平特殊经济区的开放优势,打造国际一流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发挥全国性、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辐射作用,提升东部沿海超大城市联通世界、联结全国的枢纽门户地位,提高超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人口、土地、经济等承载力,推动超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融入国际分工合作与竞争体系,优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产业链结构体系和产业链布局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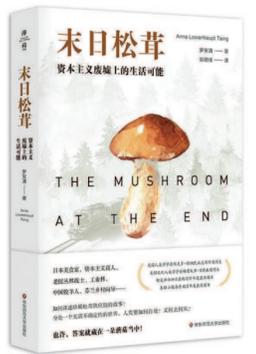
五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不犯方向性、颠覆性、不可改的错误。提升发展中大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努力的过程,要只争朝夕,更要行稳致远。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减税降费,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完善要素市场体系,激活市场主体,稳住并巩固我国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基础结构和基本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区间调控、精准调控、综合调控,坚决防止宏观财政货币政策被动地过度地放水,有效防范各级地方政府层层扩大政府性公共投资,切实遏制持续增加各种显性和隐性地方政府债务。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决防止走依赖房地产等财富驱动经济发展的路。要有备无患,加大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保护力度,尤其要把土地、水、森林、重要矿产资源等各种自然资源保护好、储存好、利用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把占世界近1/5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荐读



《考古学与史前文明:寻找失落的世界》(美)布赖恩·费根著,袁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

本书是考古领域的重磅著作,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布赖恩·费根经典之作。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考古学的方方面面——考古学的基本原则与目标、考古理论、科学的考古发掘流程、测定年代的技术、全球各地的田野发掘实践经验,以及管理和保护遗址的道德守则等;第二部分详细梳理了人类250万年的史前历史,从人类的起源、有关现代智人的争议、非洲古代人种的迁徙到农业的扩散,以及全球古代文明在公元前500年的发展。



《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罗安清著,张晓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在横跨日本东京与京都、美国俄勒冈州、中国云南、芬兰拉普兰等地的田野调查中,作者跟踪一条鲜为人知的商品供应链,一步步呈现珍稀松茸的“身份链译”:在废弃工业林悄悄破土而出,被通入山林寻求自由的瑶族、苗族与东南亚裔采摘者收集,再通过竞价激烈的保值票市场,累积层层价值进入日本,松茸成为带有强烈象征的礼物。松茸浓缩在如此奇特的跨地域、跨文化转译过程中,也提出一个更宏观的提问——在迈进“人类世”的此刻,不强调发展与进步的社会是什么模样?人类是否能与各种物种保有互不和谐、但又无须掠夺的和平共存?



《光之城:巴黎重建与现代大都会的诞生》(英)鲁伯特·克里斯蒂著,黄华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5月)

1853年,法国国王路易·拿破仑指派塞纳河省长乔治·欧仁·奥斯曼开启了一项庞大而雄心勃勃的市政改造公共工程。这项改造计划——尽管其间夹杂着战争、革命、腐败和破产——不但让巴黎的面貌焕然一新,还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城市规划树立了一个典范,并开创了现代巴黎经久不衰的城市布局。这场历时十五年的城市革新项目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的城市建设者能从中间吸取什么经验,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更人性?本书作者鲁伯特·克里斯蒂将带领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的巴黎,看它如何从一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疾病缠身的中世纪破败城市,一跃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光之城”。

锐见

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为此,科技创新工作要适应“四个需要”、坚持“四个面向”、落实“两个导向”、实施“三定三权”,加快形成战略力量体系,支撑系统能力的整体跃升。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新科技革命、新工业革命不再以单项技术突破为特征,代之以群体性突破、系统性颠覆和整体性变革为趋势。因此,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确保国民生命健康等的关键所在。

经过长期积累和持续发展,我国即将迈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一些重要的前沿领域,开始进入领跑阶段。然而,我国还远不是科技强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在体系化博弈中缺乏“撒手锏”。究其原因,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战略力量布局中,还存在不同力量主体缺位、越位以及协同不足、补位不够等现象,制约了整体实力的提升。为此,要强化战略力量的顶层设计,克服分散、低效、

重复的弊端,进行优化组合。

一是以“四个需要”为指针,明晰战略力量的核心功能。围绕“两高两新”的战略需要,明确战略力量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功能,促进美好生活实现的功能、促进双循环安全畅通的功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功能。二是以“四个面向”为重点,构建战略力量的框架体系。根据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总体要求,打造基础前沿探索力量、产业创新引领力量、战略任务支撑力量和安全健康保障力量,并在相互协同的基础上,形成高效运作的战略力量体系。三是以“两个导向”为牵引,推动战略力量的任务部署。坚持需求导向,在关乎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科学技术重大难题、世界发展格局新趋势等方面,敢于大胆想象、率先选题、超前布局。坚持问题导向,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等

方面,深入实践实地,探求症结缘由。既要抓紧推进,更要久久为功。四是以“三定三权”为原则,优化战略力量的治理机制。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将重点放在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做好服务上。赋予高校、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给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和经费使用权。逐步形成多元主体齐心协力、高效互动的科技治理新机制。

面向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在充分把握新科技革命、新工业革命趋势的基础上,深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从多方面入手,打造战略力量体系,加快实现我国科技创新系统能力的整体跃升。

一是打造基础前沿探索力量,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引育人才科学家,加强数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建设,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完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治理机

制,鼓励和支持原创性科研活动,注重非对称、非共识选题,力争在未来5—10年形成若干诺奖级科研成果。加强地方科学院建设,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互动发展。

二是打造产业创新引领力量,提升转化应用能力。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激励企业实施创新发展。确保政策落地,促进更多新型研发机构的顺利诞生和持续发展。有序推进综合性和专业性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为行业共性技术、竞争性技术研发与转化注入新动力。发掘和培育一大批能够开创未来新兴行业、新兴门类的大国工匠和具有颠覆性创新精神的科学家,造就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引领型企业。

三是打造战略任务支撑力量,提升关键攻关能力。稳步推进国家实验室部署,科学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引导和鼓励省级和区域级实验室发挥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加快实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确保我国产业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等。

四是打造安全健康保障力量,提升应急支撑能力。在公共卫生、生态环境、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等方面,探索建立国家级和区域性应急保障科研机构,以平战结合的形式,为应对类似新冠疫情、大规模生物入侵、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等提供及时有效的科技支撑。在促进国民健康安全方面,形成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

五是加强科技力量统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优良创新生态,激发科技创新新活力。整合财政科技投入体制,优化科技力量布局体系,使各部门、各类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角色更清晰、定位更准确,持续提升各类主体间的动态协同。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升公众科技素养,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汇聚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力量。

# 打造科技创新的战略力量体系

■ 李万 (上海科学院研究员)